

低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倾向

——基于积极和消极视角

管 健^{*}

【摘 要】 社会阶层是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的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在同一集团中成员之间具有相类似的态度、行为、价值和心理模式。以往研究大多倾向于低阶层的负面效应,出现典型性消极指标。事实上,低阶层相较于高阶层有许多很少被关注的积极效应。对于系统公正论、社会支配论、局部阶梯效应等理论中对社会阶层的争议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未来研究可以从影响阶层感知变量、诱导范式效果,以及启动形式的多样化、认知神经视角、跨文化的差异和干预等方面强化低阶层的优势特性,促进消极心态良性转化。

【关键词】 社会阶层;低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认知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从均等化转向为阶层化,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以往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更加注重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的考察,在心理学层面略有涉及,但相比前两个学科而言亟待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同时,相关的心理层面的研究也大多认为,低阶层囿于很多因素的干扰而呈现负面且消极的心理效应,尤其在心理健康、歧视知觉、压力体验等方面更是如此。低阶层的典型社会心理与行为倾向不断积累和积聚,进而容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一味放大低社会阶层的消极性,而忽视其积极性是否合理,由此文章在分析消极性的基础上归纳了低阶层呈现的积极效能,探讨社会阶层的差别对个体或群体的整体影响,并通过目前的相关争议性问题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心理学视角中社会阶层的概念

1. 心理学视角中社会阶层的界定。在对社会阶层的传统定义中,强调了同一阶层中群体的特

^{*}法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30007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SH076)、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课题(2015)和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的阶段成果。本文对王源在前期资料搜集中的工作表示感谢。

点,即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Kraus 等人在研究中给出的定义偏重于社会阶层的划分过程,认为社会阶层是由经济、政治等原因形成的,在社会层次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存在客观社会资源差异并感知到由此造成社会地位差异的群体(Kraus, Piff & Keltner, 2009; 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这一定义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基于经济资源、社会地位等客观信息所划分的阶层是传统社会阶层研究中的重要划分依据,而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则关注个体对于这些划分依据的认知情况。在这一定义中,被划分为同一阶层的个体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客观的社会资源差异,二是对此差异有较为准确的感知并认同这一差异的存在。

2. 心理学视角中社会阶层的测量。在社会阶层的测量方法上,研究者普遍采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对于个体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界定,常见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等。然而,这些变量都属于客观变量,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社会阶层定义中的主观成分。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心理层面乃至生理指标。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仍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对于社会阶层中主观成分进行测量和研究的重要意义(Kraus & Stephens, 2012)。在主观成分的测量中,一般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以量表法来测量社会阶层一般显现为自我报告的形式,但是由于社会阶层是极为敏感的话题,采用自我报告法常会遭到来自社会赞许性和实验者效应的干扰。

3. 心理学视角下社会阶层的多重取向。由社会阶层所引发的个体及群体差异已经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的不同研究范式之中,而心理学的研究则更关注不同社会阶层者在心理特质和社会心理表现上的差异。心理学视角下在社会阶层研究方面的四种取向主要包括:(1)社会阶层的劳资视角,该视角主要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层冲突和资本的视角,认为阶层是在权力、收入的分化下而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2)社会阶层的健康心理视角,该视角强调不同阶层的健康风险、幸福感、情绪体验、压力反应等,且由此产生健康的分化。(3)社会阶层的文化视角,该视角认为阶层逐渐具化,聚合成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态度和行为习惯,并试图从这些方面考察社会阶层间差异的本质特征。(4)社会阶层的认知视角,该视角强调阶层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并由此产生相联结的思维方式、自我概念和认知图示,以及相关的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和以社会决策为核心的社会事件认知。

二、低社会阶层的消极影响

1. 低社会阶层具有较低的生理健康状况。低阶层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会将大量的生活精力投入到谋生之中,这样一方面自身的物质资源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谋生的需要而忽视了健康的生活方式(Zapolski, et al., 2014)。也正是由于不能为自身创造资源以及更优质的生活环境,从而导致自身的生理健康状况相较于高层,反映体内压力水平的皮质醇激素就是一个较常用的生理测量指标(Johannes & Ernst, 2014)。Quon等(2014)发现,青少年更低的主观经济地位,以及个人在社区中更低的客观经济地位都会导致更差的生理健康状况,而在考虑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就业率与青少年个体的健康状况也呈现正相关。患长期慢性病的群体中,处于低阶层的青少年患有哮喘和肥胖等长期慢性病几率也更高(Schreier & Chen, 2013)。

2. 低社会阶层更具负面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阶层对于个体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除了身体方面,还来自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低阶层者在社会系统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会感

受到更多来自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并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面对生活中诸多不确定因素,低阶层无论是在潜在的意识层面还是外显的行为层面都表现出更多的谨慎、悲观和怀疑特质。额外的认知负担也往往会为他们带来负面的心理健康影响,焦虑感就是这种影响较为集中的体现之一。低阶层常自我报告带有敌意性情绪和焦虑感。研究者发现,低阶层者在与他人沟通和社会交往中,也常常会报告自己感受到更多的敌意情绪,低社会阶层个体威胁警惕性也明显高于高阶层个体(Kraus, Piff,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

3. 低社会阶层更易削弱社会决策能力。除了物质资源匮乏外,低阶层因贫困而占据或消耗了有限的心理资源,因而难于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以及在同等选择下的消极情绪积聚(Stephens, et al., 2007; 吕小康等, 2014)。低阶层会削弱个体或群体的决策能力,主要是因为低社会阶层注意力损耗、意志力损耗和认知控制损耗都诱发个体表现出非理性决策。来自死亡率较高和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低阶层被试会在决策实验中选择可以立即获得的较低收益,而高社会阶层的被试则在决策中表现出更高的延迟满足倾向,他们会把眼光放得更长远,选择进行等待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另一项研究中也证实了相似的结论,发现尽管推迟生育时间可能更有助于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但低阶层的被试仍会选择更早的年龄生育(Griskevicius, Vladas, et al., 2011)。

4. 低社会阶层具有较低的社会控制感。Kraus和Stephens(2012)利用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方法,对于低阶层和高阶层在情感与道德方面的差异做出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低经济地位的个体往往呈现出较少的自身控制感,具体会表现为无助感和对事物的不可控,以及基于环境的自我概念和社会认知倾向;而高经济地位的个体则在意识与行为中表现出更多的自由,具有基于个人的自我概念和社会认知倾向(Kraus, Piff & Keltner, 2009; Piff, 2014)。高阶层者由于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资源的支配与使用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感以及更高的心理权力(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而低阶层则具有较低的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

5. 低社会阶层认知表现与学业成绩更易弱化。社会阶层会带来认知表现和学业成绩的降低,相关的刻板印象威胁实验也不断证明低社会阶层所展现出的相对较弱的认知表现和学业成绩。Johnson等(2011)证实了不同阶层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的正相关。通过让学生们讨论关于学业成就的自我表征问题的方式来启动学生的社会阶层概念,发现在进行学业成就讨论的学生中,低阶层学生会在随后的实验过程中消耗掉更多的糖果,并在Stroop实验中表现更差,而在没有讨论学业问题的对照组,不同阶层的学生则没有表现出差异。这说明对于被试低社会阶层身份的启动会引起他们在自我控制方面更多的损耗,从而使自我控制力度降低,并同时引起认知表现的下降。

三、低社会阶层的积极效能

以上可知,以往研究大多倾向于低社会阶层的负面效应,出现典型性消极指标。事实上,低社会阶层相较于高社会阶层有许多很少被关注的积极效应。

1. 低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自我监控性。低社会阶层长期处于生活压力之下,他们更倾向于关注他人需要和他人评价,他们必须依靠他人来帮助自己达成生活目标。因此他们需要时刻监控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保证他人对自己形成良好的印象,从而获得他人的帮助。在原则问题上,低阶层者为社会规范和社会失范行为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Zapolski et al., 2014),这也是自我监控性高的一种表现。低阶层者在对待关于违反社会规范的问题上更有原则性,他们在通常情况下更不愿意

去违反社会规范；而在采取社会失范行为的时候，低社会阶层者也往往会具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他们更具自我监控性，对于自我的要求也往往更加严格，这实际上也是资源匮乏的一种长期被迫性反应使然。

2. 低社会阶层更注重人际认知。对于高阶层者和低阶层者而言，他们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数量上有所差异，这使得他们在整体的认知方式和归因风格上都存在着不同。高阶层者对于事物拥有较高的控制能力，在进行决策时也会有更宽泛的选择范围，因而其整体会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方式，在归因风格上具有内归因模式。而低阶层者由于占有社会资源较少，在其所面临的情境中容易缺乏足够的掌控能力，对外部依赖感更强，更容易听命于外部安排，因而他们容易形成外归因模式（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Kraus、Piff和Keltner（2012）将这一现象总结为，低阶层者认为社会范畴是由社会本身结构决定的，高阶层者更关注范畴本身，在解释社会事件或是贫富差异过大等社会问题时，低阶层者也会表现出从外部环境做出解释的认知倾向。此外，低阶层者会关注人际关系的认知倾向，从人际关系角度出发去认识和理解复杂的生活情境，而高阶层者则更加依赖财富的作用，因而更加关注物质资源方面的因素（Piff et al., 2012）。

3. 低社会阶层更具公正信念。公正信念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在不同的阶层中展现也有所不同。系统公正论认为，低阶层个体与高阶层的个体相比，更倾向于去维护当前存在的政府和制度，认为现存系统是公正且合理的（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Jost, 2011）。低社会阶层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Jost等（2011）认为，低阶层群体对政府更为信任和支持。这是因为，低阶层者在资源竞争中难以与高阶层者相抗衡，因此会寄希望于通过国家干预使自身的资源分配得到保障，而高阶层个体的生存依赖于自由市场的存在，其态度上更强调不依托于政府的自由感。Brandt（2013）指出，相比较高阶层而言，低阶层的被试更倾向于信任政府等社会机构，乐于维护现状。进一步看，这种自身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会转变成为对于高权威的关心。Brandt和Henry（2012）发现，低阶层反而具有更高的权威主义倾向，对权威有更高水平的服从，也更强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性。在启动了社会公平信念的条件下，低阶层群体也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心理特质，如更脚踏实地地愿意为了自己设定的长远目标而努力工作，并为此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

4. 低社会阶层更具道德感。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低社会阶层是犯罪率高发的罪魁祸首，事实上Piff等（2012）曾对于不同阶层者的道德感和道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现实场景下还是实验室中，反而高阶层更多地表现出不道德行为。例如，违反交通法规和在与他人竞争中欺骗对手，而低阶层则在道德感层面表现得更具遵从性。在一些道德两难实验中，高阶层常会忽视问题情境中的道德因素，做出更具功利主义的选择，而低阶层更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出发去考虑全局问题（Côté & Piff, 2013）。低阶层的道德感不仅在体现于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和规范上，对于社会规范的违反者也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呈现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Kraus和Keltner（2013）发现，在对待惩罚罪犯的问题上，低阶层者更倾向于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而不是像高阶层者那样简单地进行惩罚。这种差异可能是来自于对形成社会阶层观点的不同，高阶层者更认同社会阶层是建立在遗传基础和生态差异之上的，因此需要惩罚和付出代价；而低阶层认为社会阶层属性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产生影响的，因此也更加认可教育的方式可以消除罪犯的违法行为。

5. 低社会阶层更具积极情绪体验。一般性观点认为，处在社会高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更快乐，因为处在经济社会高层的人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但是相关研究却发现，高阶层的个体往往面临较大的工作和社会压力，分享亲情、友爱的时间减少，主观幸福感反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正如Paul、Melvin和Reder（1974）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认为社会阶层

与幸福感在跨时间和跨文化的比较下并无正相关的趋势,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的影响呈现负向相关。Frank (2012) 通过对于自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之后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也证实了相对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独立性。在控制了经济地位的因素之后,低阶层也会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处理人际关系而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

6. 低阶层具有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由于社会竞争和流动总体上呈现出高阶层者占主导地位,低社会阶层者很难通过个人力量改变社会环境,因此需要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以使自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李琼,郭永玉,2008)。这一点体现于人际交往之中,对于交互对象的适应方面,低社会阶层者能够在与人交往中具有更出色的察言观色能力,通过准确地识别对方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低阶层者会有意识地调整自己与对方的交流方式(Kraus et al., 2012)。另一方面,低社会阶层者在面对逆境时,也会展现出更多的心理韧性。Wu等(2011)发现,低阶层的农村青少年面对逆境时有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环境的不确定性还可能使童年贫穷的个体在挑战任务中更能坚持不懈,勇往直前(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

7. 低阶层更具社会亲和性。高社会阶层者由于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感知到较高社会地位的同时,长此以往形成自我主义的认知倾向,从而容易忽略情境因素(Piff, 2014)。相比之下,具有基于环境认知倾向的低阶层者则更容易关注到周围人所遇到的困难,低阶层者的生活状态决定着他们对于困难的场景更为熟悉,也会因此而显现出更高的共情水平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Stellar等(2012)等通过实验发现,与高阶层社会成员相比,低阶层社会成员对他人的遭遇能给予更多的共情,关怀他人所遇到的困难,并在社会互动中体现出同情行为。Kraus和Keltner(2010)对100名被试的互动后非言语行为进行编码,发现低社会阶层背景的学生互动卷入性更强,如频繁点头、微笑、挑眉毛等,而高社会阶层的个体非卷入动作更多,如无视他人的整理发型、乱写乱画和烦躁不安。

8. 低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人际敏感性。人际敏感性作为一种高社交技巧在不同阶层中是否展现不同,哪个阶层更能共情、理解、评价他人能力,并能从非言语的线索中准确评估他人的能力、状态和特质呢? David等(2010)发现,社会地位影响人际敏感,低社会阶层社会敏感度和人际敏感度更强。在人际互动中,相对于高社会阶层而言,低社会阶层的人际敏感性更高,感知能力更强,在评价和回忆他人行为和外表方面的能力也更强,这使其知晓如何取悦他人而获得更多回报。由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对于社交情境的识别能力和评估社交线索的准确度也相较于高阶层能力更强,他们实则拥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高社会阶层更加自我中心,不过多关注他人的感受和体会,是高冷群体,而低阶层更关注他人,交流中更投入,也让人觉得更温暖。

四、心理学视角中关于社会阶层的相关争议

社会阶层通过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目前存在的关于社会阶层的争议较多,其中包括哪个阶层更支持系统公正,哪个阶层更容易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等。这些研究中关注的影响和研究结果虽存在争议的,尚难于整合与统一,但是相关的讨论也逐渐使社会阶层的研究趋于深入化和系统化。

1. 哪个阶层更相信系统公正?尽管前文探讨了低阶层相对于高阶层是否更认为社会系统是公正的这一问题的,但从不同理论的视角出发,也有研究者们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社会认同理论和系统公正理论认为,低阶层的人比高阶层更倾向于相信其所处社会系统是公正的。然而,从社会支配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者认为低阶层比高阶层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系统公正论认为,低阶层个体更

倾向于去维护当前存在的制度,强调现存系统的合理性,更具有公正世界信念。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低社会阶层改变群体地位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有助于促进低社会阶层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从而改变地位,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低阶层的不公正感降低,从而起到维护和强化阶层间不平等现状的作用。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调查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发现社会阶层越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也越低,来自低家庭社会阶层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相对较低。研究者认为,低社会阶层在现实社会中会更多的体验到不公平,而持续而强烈的不公平感会成为稳定的社会认知(王培刚,2008;郭永玉,周春燕,2014)。相反,社会支配论认为,较低阶层个体更容易抱怨社会,对社会系统做出消极评价。因为这一理论强调低阶层者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拥有更强烈地想要改变自身现状的动机,所以他们认为当前的社会系统赋予自己弱势地位是不合理的,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目前,虽然两者之间仍存有争议,但是却有不少相关数据证明低社会阶层对于维护社会正义所做出的努力并不比高社会阶层少,反而他们成为社会的“稳定阀”和“安全阀”。

2. 阶层高低是否可以预测幸福? 阶层高低是否可以预测幸福感呢? 一般认为,社会阶层能预测个人主观幸福感,因而,追求高阶层和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但是Anderson等(2012)发现,社会阶层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人际尊重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反而是是否能赢得尊重可以更好地预测幸福和积极情感体验,这一心理现象被称作“局域阶梯效应”(Local-Ladder Effect)。与此相应,脑科学研究发现,如果实验者在一个小组中自认为处于劣势的话,他们的认知能力会出现下滑趋势,并会激活其大脑中与“恐惧”有关的区域,此时的实验者会对组内的优势个体产生嫉妒情绪,所对应的脑区正是“痛觉”区域;当这些优势个体出现失误的时候,实验者又会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所对应的脑区则是大脑中的“快乐”中心。按照“局部阶梯效应”的假设,如果在一个平均幸福感都很高的地区,一个幸福感较差的人很容易在与朋友比较中得到更为沮丧的结果;而如果在平均幸福感都不太高的地区,一个幸福感较差的人可能会发现,周围的朋友生活得都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自己,从而可以带来一些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反映出社会阶层与幸福之间的预测可能仍需要一些进一步的佐证,高社会阶层未必是幸福满满,而低社会阶层也未必是不幸的代言人。

五、已有的研究不足与展望

毫无疑问,关于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低阶层的消极效能常常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方面,但是从积极效能的角度重新审视低社会阶层可以从中挖掘更多的积极效应,如果加以正确引导、积极疏导、强化规范和支持,则更能充分发挥这一阶层群体的优势特性,也能更利于其发挥独特作用,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偏见消弭。当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和改进。

1. 需要更多引入对影响社会阶层感知调节变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低社会阶层的结果变量、中介变量及其导致因素等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以往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会引起环境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人们行为不同,有贫困童年经历的人会在经济不确定性时表现得更易冲动。不确定性会改变人们在环境中的控制感,而启动不确定性,会让有贫困童年经历的个体拥有更低的控制感(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同时,Kraus、Adler和Chen(2013)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降低之间存在着重要变量,即消极情绪的启动,也就是说,低阶层并不一定带来健康隐患,之所以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健康隐患,实际上是由于其具有更多的消极情绪和否定情感。由此,可以发现,阶层研究尚有许

多引导的变量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和细化。

2. 研究设计的进一步精细化和丰富化。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细化。目前相关研究以社会学的宏观层面为多,从心理学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入手,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关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仍需加强,只有采用多种方法才能有效地揭示阶层问题。如借鉴内隐认知的方法,通过反应时、情感反应强度等作为衡量标准,可适当屏蔽一些外在因素的干扰。

3. 关注阶层感知的跨文化差别。在社会阶层心理层面的已有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西方国家,事实上应重点考虑来自不同地域的研究是否考察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心理因素。毫无疑问,对社会阶层的心理感知在一定程度应具有跨文化的差别意识,如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命运观、价值体系等。在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一种个体主义文化,强调独立性自我,而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互依性,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命运观、习得性、无助性等,这些是否都对阶层的感知产生影响,都需要通过跨文化的研究去加以证实。

4. 提升低阶层群体的身心健康。社会阶层是健康和情绪问题易感性的重要预测源,也会对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作用。今后的工作任务将不断围绕着形成和影响低社会阶层的心理因素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其认知的神经基础是什么,社会阶层是如何应该和改变了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何不同阶层的人在感知、评价、适应和改造社会公正系统中表现出典型差异以及低社会阶层在这种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适应良好的生理、心理和文化机制,并在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开展心理干预且积极促进其身心健康,并致力于在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多视角下进行干预和评估。

参考文献:

- 郭永玉、周春燕, 2014:《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的双重作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李培林, 2011:《我国发展新阶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琼、郭永玉, 2008:《社会支配倾向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第4期。
- 陆学艺, 2010:《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国人口》第7期。
- 吕小康、汪新建、付晓婷, 2014:《为什么贫困会削弱决策能力? 三种心理学解释》,《心理科学进展》第11期。
- 王培刚, 2008:《当前各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动态认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
- 杨沈龙、郭永玉、李静, 2013:《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心理科学进展》第12期。
- 周春燕、郭永玉, 2013:《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4期。
- Adler, N. E., E. S. Epel, G. Castellazzo & J. R. Ickovics,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vol. 19, pp. 586—592.
- Anderson, C., M. W. Kraus, A. Galinsky & D. Keltner, 2012, "The local-ladder effect: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3, pp. 764—771.
- Chen, E. & K. A. Matthews, 2001, "Cognitive appraisal biase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in children",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vol. 23, pp. 101—111.
- Brandt, M. J., 2013,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 pp. 765—785.

- Brandt, M. J. & P. J. Henry, 2012, "Gender inequalit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authoritarian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0, pp. 1301—1315.
- David, A. K., S. Amanda, M. B. Eliane & T. H. Jeffrey, 2010,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status, and stereotype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1, pp. 1735—1739.
- Frank, R. H., 2012, "The Easterlin Paradox revisited", *Emotion*, vol. 6, pp. 1188—1191.
- Griskevicius, V., A. W. Delton, T. E. Robertson & J. M. Tybur, 2011,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in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eproductive ti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pp. 241—254.
- Howell, R. T. & C. J. Howell, 2008,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statu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4, pp. 536—560.
- Johannes H. & F. Ernst, 2014,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vol. 344, pp. 862—867.
- Johnson, S. E., J. A. Richeson & E. J. Finkel, 2011, "Middle class and margi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gma, and self-regulation at an eli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 pp. 838—852.
- Jost, J. T., 2011,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s compliment, complement, and corrective to theori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dominance", in D. Dunning (ed.), *Social Motiva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pp. 223—263.
- Kraus, M. W. & T. W. Chen, 2013, "A winning smile? Smile intensity, physical dominance, and fighter performance", *Emotion*, vol. 2, pp. 270—279.
- Kraus, M. W. & N. M. Stephens,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vol. 6, pp. 642—656.
- Kraus, M. W., P. K. Piff & D. Keltner,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pp. 992—1004.
- Kraus, M. W., P. K. Piff, R. Mendoza-Denton, M. L. Rheinschmidt & D. Keltner,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3, pp. 546—572.
- Kraus, M. W., N. Adler & T. D. Chen, 2013, "Is the association of subjective SES and self-rated health confounded by negative moo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Health Psychology*, vol. 2, pp. 138—145.
- Kraus, M. W. & D. Keltner, 2013, "Social class rank, essentialism, and punitive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pp. 247—261.
- Laurin, K., G., M. Fitzsimons & A. C. Kay, 2011,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pp. 149—171.
- Mittal, C. & V. Griskevicius, 2014, "Sense of control under uncertainty depends on people's childhood environment: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 pp. 621—637.
- Paul, A. D., W. Melvin & N. Y. Reder,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iff, P. K., 2014, "Wealth and the inflated self: Class, entitlement, and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 pp. 34—43.
- Piff, P. K., D. M. Stancato, S. Côté, R. Mendoza-Denton & D. Keltner, 2012,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09, pp. 4086—4091.
- Piff, P. K., D. M. Stancato, A. G. Martinez, M. W. Kraus & D. Keltner, 2012, "Class, chao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pp. 949—962.

- Quon, E. C. & J. J. McGrath, 2014, "Community, family,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Relative status and adolescent health", *Health Psychology*, vol. 15, pp. 741—752.
- Schreier, H. M. C. & E. Chen, 2013,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health of youth: A multilevel, multidomain approach to conceptualizing pathway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3, pp. 606—654.
- Stellar, J., V. Manzo, M. W. Kraus & D. Keltner, 2012, "Class and compassion: Socioeconomic factors predict responses to suffering", *Emotion*, vol. 12, pp. 449—459.
- Stephens, N. M., H. R. Markus & S. S. M. Townsend, 2007, "Choice as an act of meaning: The case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3, pp. 814—830.
- Tucker-Crob, E. M., M. Rhemthilla, K. P. Harden, E. Turkheimer & D. Fask, 2011, "Emergence of gene \time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fant mental ability between 10 months and 2 yea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2, pp. 125—133.
- Turkheimer, E., A. Haley, M. Waldron, B. D'Onofrio & I. Gottesman, 2003,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l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4, pp. 623—628.
- Wu, M. S., X. D. Yan, C. Zhou, Y. W. Chen, J. Li & Z. H. Zhu, 2011,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6, pp. 431—442.
- Zapolski, T. C. B., S. L. Pedersen, D. M. McCarthy & G. T. Smith, 2014, "Less drinking, yet more problems: Understanding African American drinking and related proble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 pp. 188—223.

(责任编辑:蒋永华)

Socio-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of Lower-Class: A Review fr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spectives

GUAN Jian

Abstract: A class is a social group formed by some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us share the similar patterns of attitude, behavior, values and mentality.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produced by one's membership of lower-class through such indicators: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ability to make social decisions, sense of control, 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 of stress,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fact, compared with upper-class, the positive effects produced by one's membership of lower-class have attracted inadequate attention. These effects include such aspects as stronger faith in justice, better moral sense, more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greater social affinity, greater ability to mak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better self-monitoring. Through analyzing controversies over social class in the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and local-ladder effect theory, we think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be done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variables influencing class percep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duction paradigm, diversification of priming methods, adoption of 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ference, which can enhance the advantages of lower-class and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its negative mentality.

Key words: social class; lower-class; upper-class;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